

# 墨子生卒年代考

李樹桐

## (一) 引言

韓非子顯學篇說：「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可見在戰國的末期，儒墨兩家並稱為當時的顯學，而墨子的地位，也可和孔子並駕。現在中國的獨尊儒家，起於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經過歷代帝王的奉行，始奠定了基礎。對於儒墨兩家的學術思想，我們暫置不論，單說墨子那種「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的服務精神，和墨者那種「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服從領袖，犧牲小我的精神，實在有值得令人欽敬崇拜之處。但是時至今日，孔子是俎豆千秋，婦孺皆知的萬世師表，而墨子泯沒的以至於生卒的年代都不能確定了。為崇拜這位服務大家，爰試考其生卒的年代。

## (二) 不同的各說

關於墨子的生存時代，過去和現在的學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擇其重要的，有如下數說：

(甲)司馬遷史記、孟荀列傳謂：「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乙)班固漢書藝文志謂：「在七十子之後。」

(丙)唐李賢後漢書張衡傳傳謂：「公輸般與墨翟並在子思之時，出仲尼後。」

(丁)清畢沅謂：「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

(戊)清汪中謂：「在宋景公時代。」

(己)清孫詒讓墨子閒詁曰：「史記索隱引別錄云：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後。」因作年表，起周貞定王元年(西元前四六八年)，迄周安王二十六年(西元前三七六年)。

(庚)梁啟超飲冰室全集，墨子生卒考謂：「墨子生於周貞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間)(即西曆紀元前四六八至四五八年)，約當孔子卒後十餘年，卒於周安王中葉(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間)(西曆紀元前三九〇至三三二年)，約當孟子生前十餘年。」

(辛)胡適先生在他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六篇(一百四十七頁)說：「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西曆紀元前五〇〇至四九〇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西曆紀元前四二五至四一六年)。」

(壬)錢穆先生在他著的先秦諸子繫年考辯，墨子生卒考一文裏說：「余考墨子之生，至遲在元王之世，不出孔子卒後十年。其卒當在安王十年左右，不出孟子生前十年。」因作墨子年表，起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即孔子卒年，迄安王二十

一年(西元前三八一年)，即吳起死年。

以上前五說，沒有具體的年代，容後再論，現將有具體年代的後四說，作一墨子生卒年代比較簡表於後：

生	卒
孫(詒讓)說：西元前四六八年	西元前三七六年
梁(啓超)說：西元前四六八至四五八年	西元前三九〇至三八二年
胡(適)說：西元前五〇〇至四九〇年	西元前四二五至四一六年
錢(穆)說：西元前四七九年	西元前三八一年

依上表，關於墨子生年，以胡說爲最早，梁說爲最晚，兩說之差，少則二十二年，多則可達四十二年。墨子卒年，以胡說爲最早，以孫說爲最晚，兩說之差，少則四十年，多則可達五十年。

### (三) 墨子卒年考

對於墨子卒的年代，各家主張有這樣大的差別，原因是各家所根據的材料不同，對材料的觀察判斷各異。但是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對於古人的記載輕於相信，判斷自然失真，過分懷疑，結論同樣也不正確。只有客觀的認識和冷靜的判斷，結論纔能和事實符合。

孫詒讓根據墨子親士篇的「吳起之裂，其事也」一句，判斷墨子死的時間在吳起之死以後。這種不深加考察的判斷，顯然是錯誤的。所以致誤的原因，就在誤信親士篇爲墨子所作。考墨子一書，大部分是墨子的弟子根據他生前的言行所作成，還有一部分是後人加進去的贗品，親士一篇就是贗品中之一篇。梁啓超說：「親士、修身、所染三篇，非墨家言，純爲僞託。」胡適先生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都是宣判親士篇爲後人所僞造的正確言論。

細察親士篇的內容，在思想上絕不是墨子的言論，甚至和墨子的思想相反。例如：「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磨)。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以比干之殢，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一段議論，純是道家的言論，那裡有一點像墨子的思想？一段大意，和老子所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的理論，極爲酷似，所謂「太盛難守」之論，就是脫胎於老子所說：「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所謂：「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和莊子所謂：「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的理論，何啻兩樣？而「靈龜近灼」一語，更顯明的就是莊子答覆楚大夫的那一段話。這決不是「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的墨子的思想，更不是止楚攻宋，急人之難的墨子的言論，若謂親士篇不是僞造，豈誰能信？！

被人們比作論語一樣的魯問篇裡有一段說：「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憲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這一段無異是墨子教導弟子們的全部法寶，也無異是墨子一部書的重要目錄。但是在這目錄裡，竟然找不到現行墨子開卷第一篇的親士篇的標題，這不能不作爲墨子原不會有「親士」篇的一個旁證。

親士篇既不是墨子原作而爲後人偽造，根據這篇裡「吳起之裂，其事也。」一句話，而判斷吳起死時墨子猶存，當然是不正確的。換句話說：吳起死時，墨子未必還在活着。

呂氏春秋尙德篇云：「墨者鉅子孟勝，善荆（楚）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起兵於夷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愛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之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非師即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至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辟路。』還歿頸於孟勝前。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

據此則知當吳起死的時候，墨家的鉅子已不是墨子而是孟勝了。推想此時墨子當已死去。在尙賢思想支配之下，墨家鉅子必傳於賢者，看孟勝所說：「田襄子賢者也。」的話，更可證實。墨子在止楚攻宋時（約在周貞定二十五年西元前四四四年），曾經說：「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可知那時禽滑釐已爲墨家的第二領袖，依理推測，繼墨子而爲第二任鉅子的，很可能的就是禽滑釐。但是也許是禽滑釐先墨子而死，或其他原因，事實上繼承墨子的，不是禽滑釐，竟如韓非子顯學篇所說：「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的三派分裂局面。吳起死時的那位墨家鉅子孟勝，屬於三派中的那一派，無從知道，但最低限度可以斷定：孟勝必定不是直接繼承墨子的第二任鉅子。孟勝是第幾任鉅子，無從判斷，每任鉅子的任期，也不能確定，但是根據吳起死時，墨家鉅子確是第二任以下的孟勝這一件事實，斷定那時墨子已經死去若干年，想不會是失於武斷的。

吳起死於周安王二十一年（西元前二八一年）。這一年，是墨子的生命必不能越過的一道界碑。

墨子魯問篇說：「越王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五百里以封子墨子。』」這證明吳國亡時（周元王三年西元前四七三年），墨子是生活着的。非攻中篇說：「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又證明：墨子生時，韓、魏、趙三家已經滅過智氏（西元前四五三年）了。同篇又說：「莒國之亡於齊越之間，陳蔡之亡於吳越之間。」更可以推知蔡國滅亡時（西元前四四七年），和莒國滅亡時（西元前四三一年），墨子都仍然健在着。依這個標準，試看墨子所講到的國際

情形怎樣（當然只能根據可靠的幾篇），再來推斷墨子的卒時。

非攻下篇說：「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同篇又說：「昔者楚熊麗始討（封）此睢山之間，越王繫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尚邦齊晉，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節葬下篇說：「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墨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說到楚、越、齊、晉四國，可見墨子生時的國際情形，是楚、越、齊、晉南北分立着。又據「唐叔與呂尚邦齊晉」一語，可知姜齊尚未為田齊所篡。

非攻下篇又說：「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有餘國皆滅，而四國（楚越齊晉）獨存。」墨子由四國分立說到四國獨存。所謂「四國獨存」，當然是四國之中，沒有一個被滅滅的意思，假設四國之中有一個被滅亡，決不能再繼續說：「四國獨存」的。考「四國獨存」局面的打破，是由韓、魏、趙三家的分晉。墨子再三提到四國分立，絕未道及三家分晉，可以推知墨子沒有看到三家分晉的事實。換句話說：墨子的死，當在三家分晉之前。

按三家分晉，是古今的大變。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即以三家分晉的那一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四〇三年）為起點，並且認為這件事是「壞君臣之禮，而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開始的標誌。墨子是主張兼愛、非攻最力的，他日夜不休的想着實現他的主張，他對於篡君之位，奪人之國的不義行動，是深惡痛絕的。他常常認為攻人之國，比較竊人桃李或取人牛馬的不義更大。他把那不知攻人之國為更大的不義的人，比喻為：「多見黑白，多嘗苦曰甘」。他評論罪惡的標準是：「虧人愈多，其不仁茲（滋）甚，罪益厚。」他曾在非攻上篇和天志下篇裡反覆的申說他這主張，可見他對這點，是絲毫不肯放鬆的。但是遍查墨子全書，只能看到：「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兼愛上），「諸侯之相攻國」（同上），「國與國之相攻」（兼愛中），「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同上），「大國之攻小國也」（兼愛下），「舉其國以攻人之國」（同上），「今至大為攻國，則弗知非」（非攻上），「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節葬下），「處大國不攻小國」（天志上）等等，絕找不到「篡人之國」或「竊人之國」的記載。我們只看到智伯攻中行氏，范氏的「並三家為一家」，絕尋不到韓、魏、趙對晉的分一家為三家，只能看到墨子再三的說：「四分天下」，而從未看到他說七分天下。主張「虧人愈多，其不仁茲（滋）甚，罪益厚」的墨子，對於三家分晉的大不義，是不會不加反對的。何至於知而不言？假如墨子生前曾經看到三家分晉亦曾言之，他的弟子們何至於略而不書？墨子的弟子們和後人，能把墨子死後的事，混寫進出（如吳起之死），對於墨子絕不會忽略的大事，反倒略而不書。不只墨子全書沒有言及三家分晉，而且從未提及篡國或竊國的字樣。如此還說墨子在三家分晉時還沒有死，豈誰能信？

三家分晉的那一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四〇三年），是墨子的生命絕不能通過的第二道界碑。

墨子魯問篇說：「子墨子見齊大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

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對於以上所記墨子見齊大王田和事，胡適先生根本不予承認，他說：「魯問篇是後人所輯，其中說的齊大王，未必就是田和，即便是田和，也未必可信。例如莊子中所說莊周見魯哀公，難道我們便說莊周和孔丘同時麼？」（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六篇墨子傳略），孫詒讓不只相信墨子見過田和，並且據此判斷墨子之死在田齊列爲諸侯之後。究竟墨子見過齊大王田和沒有？假若見過，是在什麼時候？這是我們研究「墨子卒時」問題以前，所必須求得解答的。

對於記載墨子見齊大王故事的魯問篇，胡適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六篇第一章裡，曾經加以評價。他說：「第四組耕柱、貴義、公孟、魯問、公輸、這五篇，乃是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指尙賢、尙同、兼愛、非攻、節用等篇）還更爲重要。」胡先生這評價是很正確的，但不知胡先生爲什麼把自己所承認的許多重要的墨子言行之一——見齊大王事，反加以否認呢？莊子一書內多寓言，怎能和記實的魯問篇相比？胡先生在前面曾肯定的將墨子魯問等篇比作儒家的論語，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孔子傳略裡又說：「一部論語雖不是孔子做的，卻極可靠，極有用。」同論語一般的魯問篇，怎麼又不可靠呢？

其次魯問一篇，除記墨子見齊大王事外，還記載着魯君問墨子的談話，墨子和齊將項子牛的談話，墨子和公輸般的談話，墨子和公尙過的談話等等。和公輸般的談話，可以和公輸般篇裏所記墨子止楚攻宋事相映證。而墨子止楚攻宋一事，並見於戰國策的宋策，和呂氏春秋。墨子和公尙過談話事亦見於呂氏春秋。可見這些故事並非出於虛構的。在一些真實故事裏，何以單獨墨子見齊大王一事不可信呢？

第三魯問篇內包括有墨子弟子勝綽對項子牛三侵魯而三從，墨子使高孫子請而退之的故事。有魯君因齊將伐魯而問墨子的故事。有齊將伐魯時，墨子勸止項子牛伐魯的故事。有墨子見齊大王的故事。這些故事是一連串的，也就是一件事情的幾段。整個的故事是：墨子弟子勝綽事齊將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而勝綽三從，墨子爲他不能止齊伐魯而退之。不久以後，齊又有伐魯的消息，魯君聽到有些害怕，因問於墨子，使去齊國。墨子先因其弟子勝綽的關係見項子牛，然後又見齊大王田和（那時，正爲齊相）。見項子牛是墨子見齊大王的序幕，見齊大王是墨子受魯君之託而去齊國的目的，正如墨子止楚攻宋時，先見公輸般而後見楚王是一樣的。只見項子牛而不見齊大王，其不能解決問題，一如只見公輸般而不見楚王一樣。墨子止楚伐宋時，是確曾見過楚王的，到止齊伐魯時，怎能只見項子牛不得要領而還呢？最講實利的墨子，何至於作了一件事情的前段而停止下來不作後段呢？以墨子見楚王的事實來比較推測，則墨子必定是見過齊大王的。

再看魯問篇裏所表現的思想，完全是墨子最基本的理論，例如：「處高爵，則以讓賢也，」正是墨子所主張的尙賢。「多財則以分貧也」就是兼愛的思想。甚至於：「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兔，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



白，大視白則謂之黑。」等句，完全和非攻上篇的字句相彷彿。這是不能和對親士篇一樣評價的。再退一步說：普通對字抄寫錯誤的，一是字形相似，如太和大，王和主，襄和哀之類。二是字音相似，如莊公、康公、襄公，成公、靈公、平公之類。齊大王以前爲悼子（據竹書紀年），以後爲桓公和威王，在字形上和字音上，全沒錯誤的可能。而且其他各王更在大王之後。如此，墨子見齊大王的記載，當非誤記或後人的偽造，於理當可信而無疑。

關於墨子見田和的時間，孫詒讓認爲在田和列爲諸侯（周安王十六年西元前三八六年）以後，這論證顯然是錯誤的。考田和列爲諸侯之時，並沒有稱爲王。大王之號，乃是他死之後，他的後裔改稱王時所追尊之詞（先追尊太公，後改大王）。根據墨子見齊大王的記載，只可以判斷墨子曾經見過田和，或者判斷墨子的弟子記載此事時，田和已被追尊爲齊大王，而不能斷爲墨子見田和的時間在田和列爲諸侯以後。依此理論類推，我們不能根據孟子所說：「昔大王居邠，狄人侵之」的話，而判斷狄人侵古公亶父的時間在周稱王以後。也不能根據陳壽所說：「羽……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紹）軍。」的記載，而判斷爲關羽之死在劉備稱帝以後。考史家記事的嚴密精確，莫過於司馬遷，他作史記時，定書職之法，如書漢高祖起事時則稱劉邦，稱沛公時則書沛公，封漢王時則書漢王，即帝位後則稱帝。以後范曄的後漢書，陳壽的三國志多不及此（如後漢書對光武帝未即位前亦書光武）。墨子弟子多是任俠之士而不是史家，時間又早在司馬遷以前二百餘年，對於史事的書法，怎能責其如司馬遷那樣的精嚴？我們不能承認孫詒讓的判斷，理由即在此。

墨子見田和的時間，固然不能限於田齊列爲諸侯以後，但是依情理推測，墨子見齊大王的目的是止齊伐魯，墨子見齊大王的時間，必定是在齊大王爲齊相執有政權的時期裏。魯問篇所說：「魯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所指的魯君，依孫詒讓的考證，認定是魯穆公。錢穆先生在他所作墨子遊齊考、魯穆公禮賢考諸文裏，屢次承認孫說爲是。魯問篇說：「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又說：「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這兩件事發生的時間，雖未書明何先後，但是根據墨子去楚見公輸般時，公輸般已是發明雲梯而具有攻宋指導人的資格那個前例推斷，墨子去見項子牛時，項子牛已是齊國三侵魯地的重要將領了。不然，墨子又何必於見齊大王之前，先見項子牛呢？總之，墨子見齊大王的時間，應當具有下列三個條件，纔最爲合理。

（一）田和執齊政的時期。

（二）魯穆公在位的時候。

（三）齊國三侵魯地以後。

齊國三侵魯地，各在何年？孫詒讓不能確定，他懷疑最早的一次爲魯元公十七年（周威烈王十四年西元前四二二年），伐魯（萬）及安陵，最晚一次爲魯穆公十四年（周安王八年西元前二九四年）伐魯取最。查二事前後相距，有十八年之久，十八年內

的三侵，在習慣是不能串在一氣的。考齊國的世卿，並無項氏一族，項子牛當係新興的非世襲的將領。他未必能一氣任齊將十八年，勝綽也未必能一氣事項子牛十八年。況且前面的結論判斷墨子的生命絕不能達到三家分晉的時候，（西元前四〇三年），那末，在孫所疑的齊三侵魯地以後（西元前三九四年以後），墨子已死，又怎能去齊國見項子牛見齊大王止齊伐魯呢？所以斷定孫詒讓所疑的三侵魯地的時間，必不正確。

考史記六國年表載：齊宣公四十四年（周威烈王十四年西元前四一二年）伐魯莒及安陽。齊宣公四十五年，（周威烈王十五年西元前四一一年），伐魯取都（田敬仲完世家云：取一城），齊宣公四十八年（周威烈王十八年西元前四〇八年），取魯郕。此三役前後只距五年，連接起來，稱為三侵，則項子牛在此五年以內連續任齊將，勝綽連續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都是合於情理而可信的事。如此則三侵魯地最後的一次，當指齊宣公四十八年取魯郕的一次。現在可以得一結論說：墨子去齊見齊大王田和的時間，必在齊宣公四十八年齊三侵魯地以後。

據史記六國年表，魯穆公元年係周威烈王十九年（西元前四〇七年），這年正是齊國三侵魯地最後一次取魯郕之年的第二年。

田和初執齊政的時間，據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為齊宣公四十五年（周威烈王十五年西元前四一一年），索隱云：「紀年：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立田悼子，悼子卒，乃次立田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立年無幾，所以作系本及史記者，不得錄也。「水經瓠子水注引紀年云：『晉烈公十一年，田悼子卒。』查晉烈公十一年，即周威烈王十七年（齊宣公四十七年西元前四〇九年），在田莊子卒年之後二年，與索隱所云「立年無幾」正相吻合。如此，則田和繼田悼子而執齊政的時間，當就在這一年。茲依史記六國年表，田和相齊的第二年（周威烈王十八年），齊國就伐魯取郕（就是三侵魯地的最後一次），第三年（周威烈王十九年），就是魯穆公元年，齊國伐衛取毋丘。依理推測，很可能是田和看到魯穆公新立，想着乘戰勝衛國的餘威，又要對魯發動新的侵略，消息傳到了魯國，魯國的新君穆公看到齊國以前三次來侵的創傷，想着改變以前魯元公戰敗就割地的舊作風，仰慕曾經止楚伐宋，譽高望重的墨子，不禁的就要向他領教領教，企圖他老先生到齊國去辛苦一趟。墨子這時人雖老而心不衰，回憶起當年止楚伐宋的光榮，仍然抱着他那「摩頂放踵而利天下」的精神，便去齊國。先因他的弟子勝綽事項子牛的舊關係去見項子牛，然後再見實際握有齊國政權的田和。這是一串故事的自然發展。墨子魯問篇記墨子見齊大王田和的談話末一段說：「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雖未明記齊大王是否停止伐魯，但依「我受其不祥」的語句，似乎是停止伐魯了。據史記：從魯穆公即位之年起，十三年裏，找不到齊國伐魯或伐其他國家的記載。這是史記和墨子暗相符合處，也許就是墨子見齊大王的效果。

依據以上，墨子的去齊國見齊大王田和，以周威烈王十九年和二十年（齊宣公四十九和五十年）的兩年裏，最為合理，周威

烈王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的兩年裏，亦不無可能。根據以上墨子的生命必不及三家分晉之時的結論，縱然墨子的生命可能達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但是絕對不能過完這一年。所以斷定墨子之死，最大範圍不出周威烈王十九年到二十三年（西元前四〇七到前四〇三年）的五年裏。

#### （四）墨子生年考

在研究墨子生年以前，先要研究孔子卒年（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四七九年），墨子是否已經誕生？想解答這個問題，要看墨子和孔子間的關係。

墨子公孟篇有一段說：「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胡適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裏，曾認定公孟篇同儒家的論語一般。以上記載，當不是後人所偽造。

考墨子一書，對於時間的書法，頗爲注意，對於過去的事蹟，常常冠以「昔者」、「古者」、或「昔」等類字樣，對當時的事，則冠以「今」字。用「昔者」之例，除以上所引「昔者聖王之列也」外，仍有「昔者吳王東伐越，棲於會稽」（魯問篇），「昔者越王句踐好勇」（兼愛下），「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兼愛中）等。用「古者」之例，有「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非攻中），「古者吳王闔閭敎戰七年」（同上）等等，不勝枚舉。用「今」字之例，如「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非攻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天志上），「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節葬下）等等，無一不是指墨子當時而言。依此標準，明明記公孟子告子墨子說：「今孔子博於詩書……」等語，則可知公孟子和子墨子談話時，孔子必尚未卒。換句話說：孔子卒時，墨子必定已經誕生了。

被胡適先生視爲和論語同樣價值的耕柱篇有云：「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間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近也（當爲之）而舊者新是（當爲之）哉！……」錢穆先生謂：「孔子遊蔡遇葉公，墨子尙未生，此云聞其問答，亦謂得之博聞，非謂墨子已生，有知識能云云也。」（見錢著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卷二墨子生卒考）。

考葉公問政事，論語亦有同樣記載，其事當爲真實。這事發生之時，墨子已生或未生？要看「子墨子聞之曰」一語如何解釋而定。如何解釋問題，我們不可主觀的臆斷，必須從墨子一書和在其前後所成各書裏，研究有關「聞之曰」一類記載所指的時間，然後可以推知。



第一：在墨子書裏至少可以找到以下數例：

(甲) 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魯)陽文君曰……(魯問篇)。

(乙) 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箒而望人厚……」(魯問篇)

(丙) 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魯問篇)

(丁) 公輸盤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見公輸盤……(公輸篇)

第二：在墨子一書前後所成各書裏，略舉數例：

(甲)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八佾)

(乙) 子產論毀鄉校(非引原文)，仲尼聞是語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丙) 達鄉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論語子罕)

(丁)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以簡，不亦異乎？」(孟子離婁下)

(戊)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史記孔子世家)

據以上各書所記，孔子和孟子所聞的事，都是他們生時的事，絕沒有一件是他們未生以前的事。(孔子孟子評論生前的事時，前面但書「孔子曰」或「孟子曰」，而無「聞之」字樣。例如左傳宣公二年載董狐書「趙盾弑其君」事，左傳宣公九年載「陳靈公殺泄治」事後的孔子評論。孟子離婁下「子產以其乘與濟人」事後的孟子評論等是)。墨子所載墨子所聞的事，也都是他生時的事，墨子所聞的葉公問政於孔子一事，書法何以能單獨例外呢？如此可以確定：葉公問政於孔子之事，決不發生於墨子誕生以前。換句話說：葉公問政於孔子之時，墨子必已生於人間。

考葉公問政於孔子之年，爲周敬王三十一年(西元前四八九年)，較孔子卒時(周敬王四十四年)早十年。假設墨子生於葉公問政之年，則孔子卒時，墨子應爲十一歲。十一歲的青年墨子，縱然是幼而慧敏，但是也決不能不受年齡的支配，那裏能說出公孟篇所載的和公孟子談孔子的話來？所以斷定孔子卒時，墨子的年齡，應當大於十一歲。

淮南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所謂：「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這不一定是直接受教於孔子，由孔子的弟子間接的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都是很可能的事。

墨子的國籍，說法不一，孫詒讓認定他爲魯國人，大致可信。另外也有認爲他是宋國人的(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

引抱朴子、荀子修身篇楊註、元和姓纂等）。縱然他是宋國人，第一宋國距離魯國不遠，第二墨子常常住在魯國，和魯國的關係極為密切，是毫無問題的。

孔子在「有教無類」的原則下，廣收博教，收納弟子號稱三千人。當時孔子弟子的國籍，魯、齊、宋、曹、衛、陳等國的較多，甚而有遠至吳國的（如言偃）。孔子自己嘗說：「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也。」可見人們得受孔子的教育，並不困難。所以孔子弟子們的身世，富的固然也有（如子貢），還是貧苦的佔絕大多數。如顏子居陋巷以瓢飲，曾子耘瓜，其母親織；閔子騫着蘆衣爲父推車；子路食藜藿負米；原思居窮巷，敝衣冠；樊遲請學稼圃；公冶長曾在纆紲；有子爲卒；仲弓父賤人；子張魯之鄙家等等不一而足。依國籍言，墨子無論是魯國人或宋國人，都不至於因距魯國遠而不能在魯國求學，依身世言，墨子既能「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當然不是貧的不能受教育，但是在孔子弟子的名單裡，竟找不到墨翟其人，在孔子弟子們所輯成的論語裡，亦未見及墨子的名字。他能間接的受到孔子之術，而不能直接受到孔子的教育，其基本原因，當係年齡問題。可見墨子的年齡，一定較孔子的一般弟子爲幼。

查孔子弟子的年齡，除較長的不計外，較幼的一批，當孔子卒時，顏師師是二十五歲，冉孺、曹卹、伯虔均爲二十三歲，公孫龍二十歲，最年少的叔仲會爲十九歲（以上俱見於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依前所述理由，孔子卒時，墨子年齡應當尙不及十九歲。

孔子講「仁」，墨子亦道「仁」和「義」（見非攻、貴義等篇），孔子講「節用而愛人」，又說：「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墨子則講節用。孔子說：「夷與其易也，寧戚。」孔子之子孔鯉死，有棺而無槨，顏淵死，孔子不答應門人厚葬的要求，都是孔子不主張厚葬的表現。墨子亦講節葬。看孔子卒後，「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史記孔子世家）的情形，假設墨子能作孔子的弟子，固然不會反對孔子，以孔子的節儉，不是孔子弟子的墨子，也沒有理由反對孔子而向儒家革命的。公孟篇載：「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其）當而不可易者也。」這是墨子不反對孔子而稱讚孔子的明證。（非儒篇爲後人僞作，不足據）。墨子之所以反對儒家，是因爲儒家「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的。儒家的有這樣值得墨子反對的現象，不是孔子卒後馬上就形成的，勢必要經過八年十年甚至十多年，纔能漸漸的演成的。假設孔子卒時，墨子已超過十九歲，第一和上述理由不符，第二，到儒家演成其禮煩擾，厚葬久服的時候，墨子已超過三十歲或將四十歲了。他的血氣既定，又受社會環境的潛移默化，很容易發生「久則安之」的心理，那裡還能「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向儒家革命呢？而事實上墨子後來確切有反對儒家的言行，這又是墨子的年齡幼於孔子一般弟子，未及直接受教於孔子的理由，也就是孔子卒時墨子未及十九歲的又一證。

考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西元前五五〇年），載齊侯中止與臧紇（臧武仲）田事（非引原文），後面有孔子的評論，只記「仲尼曰」

而無「聞之」字樣。同書襄公二十五年（西元前五四八年），陳及鄭平事後孔子的評論，亦同樣的只記「仲尼曰」而無「聞之」字樣。到襄公三十一年（西元前五四二年），子產論毀鄉校事後面孔子的評論，便改為「仲尼聞是語曰」而加上「聞」字。考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纔兩歲，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四歲，及襄公三十一年，孔子已達十歲。左丘明記孔子四歲前對事的評論，不書「聞之」字樣，記孔子十歲時對事的評論，就加上「聞」字，這大概是四歲以前的孔子，尚無聽的能力，或距其評論時太遠，孔子十歲時候已有聽的能力或距其評論時較近吧。（其實孔子十歲時所發生的事，孔子也未必能即刻聽到而加以評論，也許是三年五年或更多年以後的事）。

單單根據是否用「聞」字而臆測評事人的年齡，當然是不一定正確的。我們固然不能單獨根據左傳上的例子而判定葉公問政之時墨子的年齡是四歲到十歲，但是借此作一假設，以試測其他條件，那倒是不妨的事。

茲假設葉公問政於孔子之時墨子五歲，則孔子卒時墨子十五歲，第一不只公孟子對墨子說：「今孔子博於詩書……」等語為合理，而且墨子的答話亦可符合於他的年齡。第二我們沒有理由限制墨子聽到葉公問政事的時間一定在孔子卒前，也可能在孔子卒年以後（和墨子與公孟子談話時必在孔子卒前不同）。十五歲或更大的墨子聽到葉公問政事時，在年齡上當然可以說出「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對也。」的話來。如此依樣假設葉公問政之時，墨子為六歲、七歲或八歲，就是孔子卒時，墨子年齡為十六歲、十七歲、或十八歲，也不至於發生不可解的矛盾。但是假設葉公問政之時墨子九歲，（即孔子卒時墨子十九歲），便與前面已得的結論衝突而喪失可能性了。再假設那時墨子四歲，葉已和左傳的書法相違而減少可能性。縱然因為左傳的書法不是鐵則而從寬認為可能，但是依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的例子推斷，在十四歲或更小的墨子（因墨子和公孟子對談時，一定在孔子卒前），也難以談出和公孟子的對話來。所以斷定葉公問政時，墨子至少是四歲，決不會再小。至多也不能超過八歲。

依上所述可知孔子卒時，墨子年齡當在十四歲至十八歲之間。換句話說：墨子之生不出周敬王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西元前四九六到前四九二年）的五年裏。

## （五）總論

當葉公子高問政於孔子時，墨子已是四歲到八歲的幼童，到墨子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他至少已有十歲甚至十五歲以上，他對這事加以評論，當然可以記為：「子墨子聞之曰」。孔子卒時，墨子至少有十四歲，因為他天資的聰穎，所以能和公孟子評論孔子。因為那時孔子尚健在，所以墨子公孟篇所載公孟子和墨子談話可說：「今孔子博於詩書」。雖然如此，但是墨子終因年齡尚不及孔子最幼的弟子，所以未能直接受到孔子的教育，及年齡稍長後，受教於某位孔子弟子，正如淮南要略所云「學儒者

之業，受孔子之術。」那時，他間接聽到更多的孔子言行，對孔子很加稱讚。但是終因人微言輕，不為孔子一般弟子所注意。所以他們把孔子的言行集起而成論語初稿時，便因孔子生前，墨子不會作過他們師生談論的對象，而沒有把墨子記載進去。在孔子卒大約十餘年以後，自命為儒家的人們，漸漸不能實行孔子節用的教訓，而形成禮節煩擾，厚葬靡財的現象。因此引起墨子的不悅和不满，那時他約有三十歲左右，他便廣收弟子，提倡節用節葬，對不遵孔子遺教的「儒家」，樹起革命的旗幟來。但是墨子並不反對孔子個人，所以墨子公孟篇尚保存着「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的一段真實記錄。墨子又看到當時諸侯的互相攻伐，因提出兼愛非攻等主張。他不單獨提倡理論，並且注重身體力行。

當墨子四十多歲時，他的弟子已多至數百人。他的弟子們固然被訓練的都能「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而墨子也因為經常的過着如夏禹一般的勞動生活，鍛鍊的身體壯健直如三十許歲人。大約在周貞定王二十五年（楚惠王四十五年西元前四四四年），墨子聽說楚國用公輸般造成雲梯將要攻宋，他就一面派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守圍之器，到宋國助宋防守，一面自己日夜不休的經十日十夜而至楚。連見公輸般和楚惠王，先經過一番勸說，又經過「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距之」的精彩比賽，終於得到「公輸般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有餘。」的結果，而迫使公輸般屈服。楚國攻宋事，因之便烟消雲散了。

墨子到了八十多歲時，墨者在各國已有相當勢力，墨子在魯國已成爲國老的資格。魯穆公聽說齊將伐魯，請他到齊國去設法阻止。他先見了三侵魯地的將領項子牛，然後又見了實際握有齊國政權的齊相田和（即後來被迫封爲齊大王的），說了一段如魯問篇所記的談話。田和怕將來受到不祥的惡果，因之中止了伐魯。究竟墨子這時年齡已高，和在楚國止楚伐宋時，已不相同，前時能動口也能動手，有聲有色，最爲精彩，後時因血氣已衰，只能動口而不能動手，雖能止齊伐魯，但使人對他有所不之末之感。正因為墨子是風燭殘年，在齊國費盡心機的去交涉折衝，再加在齊魯長途道路上受了許多風霜之苦，所以於歸魯後不久（或不幾年），這位克己爲人的老墨子，就以身殉道，與世長辭了。

墨子死後，弟子們把他生前的言行聚集起來，作成類似論語的墨子，漸漸由初稿演變而成定稿。那時，田和篡齊已成過去的歷史，人們對他的稱呼，已由太公變爲大（即太）王，所以魯問篇也就順便的採用當時一般人所通用的稱呼，寫爲「齊大王」而不書爲「齊相田和」。這樣不夠和後來司馬遷作史記那樣精嚴的史法，也是墨子弟子們作書的當時以及後世的史家通常要犯的毛病，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墨子這書，經墨子的弟子們寫成後，流傳於世。有些墨者憑個人之所願，有時會增加進去幾句或幾篇，甚至於道家的讀者，也要借墨子之名以傳揚自己的學說，因之也把道家思想加入。例如非儒篇就是以以後的墨者加入的，親士等篇，就是後世的道家加入的。但是這些偽作，不免留下洞隙，終不能完全騙得過後世人的眼睛。例如（一）雖有親士、非儒等篇文字加入，而魯

問篇所說墨子重要目錄裏並未增加篇名。(二)非儒篇誹謗孔子，公孟篇稱讚孔子；真偽的內容衝突。(三)親士、修身、所染等篇所表現的思想，根本和墨子的思想相反。只有魯問篇墨子所說出的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兼愛等篇是可靠的。關於此點，以胡適先生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裏所作的判斷，最爲正確。

孫詒讓誤認親士篇爲真，所以根據「吳起之裂，其事也」一語而判斷吳起死時墨子尚存。畢沅誤認非攻中篇「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者」一語而判斷墨子至周末猶存。其他或輕於相信或過分懷疑的判斷，同樣的都不正確，都非真實。茲不贅論。

司馬遷作史記，對史料的選擇，非常審慎。他曾到處遊歷訪問（如適豐沛問其遺老，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等）。他對於所聞還要加以證實。（如過淮陰聽到韓信爲其母擇墓地要在高地旁邊可住一萬多家的故事，即親往視韓信之母的墓等）。他有時還要更進一步追問原因（如過薛，其俗閭里多暴桀子弟，問其故等）。他曾經南遊江淮，北涉汶泗。當他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時，竟至於「祇回留之，不能去」。那時，上距墨子之死，不過三百年，墨學雖衰，但猶有傳者。司馬遷之所記，想必係得之墨者故老的傳聞。因不能十分肯定，所以並存兩說。正因為他的並存兩說而加以「或曰」字樣，更足以顯明他的不肯武斷，而並存的兩說，都是有根據的。原來墨子死後，墨家分爲三派，各派根據一部分事實，相傳下去，日久之後，在表面上看好像似成爲不同的兩說了。到西漢司馬遷時，便無人能判斷這兩說孰是孰非，或各有其是。司馬遷一時也不能決擇，爲保持他所訪問的真相，所以就並存兩說，並註明「或曰」以表明其來源。其實這兩說不過是一件真實事蹟的兩面罷了。總之，在各家之中，以司馬遷上距墨子時代最近，對於史事的記載，最爲審慎，所以對於墨子生卒的時代，雖然沒有記載出來具體的年代，而實際上最爲正確。班固和李賢的措詞，雖然各有不同，但是所指墨子生存的時代，大致和司馬遷所記沒有大的差別。

本文所作結論，除墨子論葉公問政，與墨子和公孟子論孔子事，俱能與他的年齡符合已見於前外，茲再作驗證於後：

(一)本文謂墨子卒於周威烈十九年到二十三年的五年裏，則吳起死時墨子已死過二十多年了。和韓非子顯學篇所說墨子死後墨家分爲三派，固無抵觸，和呂氏春秋尚德篇所記吳起死時墨家鉅子爲孟勝，亦可一貫相通。

(二)汪中謂「墨子亦壽考人歟？」，按墨子終天過着和夏禹一般的勞動生活，其身體當然健壯，年壽必高。依本文結論計算，墨子年壽在八十六歲以上，於理亦無不合。

(三)李賢謂墨子在子思之時。考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西元前四九三）——據胡適先生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一百四十四頁。依本文墨子生於周敬王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的結論，則墨子或與子思同年生，或稍長稍幼，最多也不過長三歲。和李賢之說，可謂相符。

(四)班固謂墨子在七十子之後，本文謂墨子較孔子弟子最年幼的叔仲會尚幼一至五歲，彼此之間，亦能吻合。



(五)司馬遷謂：「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本文謂孔子卒時墨子約十四歲至十八歲。這可符合於「並孔子時」，依本文結論計算，墨子的生命約有七十年左右是在孔子卒後，也可以與「或曰在其後」相符合。

最後作一簡明結論：墨子生時不出周敬王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西元前四九六到前四九二年）的五年裏。卒時不出周威烈王十九年到二十三年（西元前四〇七到前四〇三年）的五年裏。年齡少則八十六歲，至多不得超過九十四歲。在生卒時間的兩端，若將可能性較小的時間除去，墨子真實的年齡，大概不超過九十歲。